

第一章

“三个代表”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新世纪的一部解放思想的政治宣言书，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是判断当代中国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我们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会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来的认识必然有所不同，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是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争论。问题的关键是，一个理论、学说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能只看它所提出的理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语录、思想体系，而是看在实践中是否推进共产主义事业发展，能否真正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能否代表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换言之，能否把“三个代表”的理论真正付诸社会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新展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江泽民在庆祝

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一百五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结论。“与时俱进”四个字，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性、当代性，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指明了当代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 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 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常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要求，根据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不断地开拓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众所周知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突破性的贡献 集中表现在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的修正和新经济政策的及时提出。列宁在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问题。1917年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①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基本上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

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①他在 1917 至 1920 年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并付诸实践。不久，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迫不得已建立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统一分配一切必需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招致农民的强烈不满，对此，列宁及时作了反思。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②1921 年 3 月 俄共举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带有根本性的深刻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结论性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③

与时俱进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品格。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突破了俄国革命由城市到农村的模式。这里的“时”，指的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这个特别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城市是敌人的势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城市搞革命暴动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的过程中，逐步把握了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独特国情，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① 《列宁全集》第 1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7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76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67 页。

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他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的二重性，创造性地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思想，实现了对制度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的有机结合。但是在 1957 年反右斗争以后，毛泽东的主观认识越来越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接连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这也从反面说明，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也会犯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邓小平反复强调，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政治胆略，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带领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的思想宗旨。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生动发展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在时代、形势和实践发生剧烈而又深刻变动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与时俱进，关系到能否

真正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境界，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高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崇高理论追求和清醒、自觉和无私的思想境界。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再告诉我们，阻碍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主要障碍是教条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排除教条主义的阻力。

教条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教条主义者不是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去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从本本出发，以静止的思想观念到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去寻找某些词句、观点，作为包医百病的药方。教条主义经常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只能顶礼膜拜的神圣教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反对教条主义就成为共产党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首先擎起反对教条主义的大旗。马克思在他理论活动的初期就郑重声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恩格斯同样是不遗余力地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在其发表二十五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就以鲜明的态度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大工业、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革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命的实践经验，“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①他们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

列宁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他郑重地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③他向后人昭示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④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胜利的思想，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可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功。同样是凭着这种科学的态度，列宁走出了曾经一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教条式的理解，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作为思想前提的。

在民主革命的早期，由于我们党理论上的不成熟，党内存在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教条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敌人。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本本主义者死守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词句，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的错误立场，把俄国革命的道路和革命战争的规律生硬地搬到中国，结果导致苏区的丧失，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空前打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率先喊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要求全党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特点，提出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主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结晶。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深刻地揭示这种结合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②

建国后，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态度前后表现出较大的反差。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他多次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他特别指出：“马、列是指导，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我们要产生自己的理论。”^③这一时期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学说等观点，都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课题的理论结晶。但是在毛泽东晚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204页。

对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上存在一定程度教条主义的理解，导致在实践上发生严重失误。

反对教条主义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文革”结束以后，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成了事关中国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因此，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再一次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亲自领导和主持下，我们党通过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举措，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所没有的，都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突破和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体现在它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历史经验的科学结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①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充满着反对教条主义的科学态度。他把反对教条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最基本的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具体结论，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它的科学

《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91页。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包括重要结论）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分析具体问题而得出的结论，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果把这些具体结论，哪怕是重要结论都当成是基本原理机械地搬用，势必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之中。江泽民指出反对教条主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为此他提出了实现‘三个解放’的重要思想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①“三个代表”理论是江泽民运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而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

江泽民在全军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切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榜样，他们从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511 页。

不教条，从不僵化，总是与时俱进，总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江泽民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努力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如果一切都要先看本本上有没有，老祖宗讲过没有，就很难在实践中迈开步子。

二、解放思想的科学结晶， 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础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新概括、新发展，形成了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新的科学理论体系。“三个代表”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新世纪进一步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科学结晶，又是统一思想、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党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解放思想的科学成果

总结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二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三是怎样搞好共产党的建设？其实这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价值目标，共产党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主体。如果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僵化地对待社会主义，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党的建设，都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甚至会葬送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因此，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搞好党的建设。

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就能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能引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教条式地、错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陷入了僵化、停滞，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和损失。不断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前提，也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条件。

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党的领导人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国际指示和苏俄革命经验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在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导致了党内接连出现“左”、右倾错误，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与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同，毛泽东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命题，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主张。他带领全党从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俄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的思想中解放出来，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道路、领导力量和阶级基础，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整风的过程中，他精辟地阐明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党的七大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范畴，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又是全党思想统一的理论基础。七大以后，我们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全党同志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邓小平也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同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 那末 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①江泽民告诫全党：“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特别强调要“始终坚持”而不是有时坚持有时不坚持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经典作家提出的个别观点、结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才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思想继承和理论创新的科学结晶。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应当说，在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确立了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在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接连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陷入了理论的误区：在生产领域追求大跃进，在生产关系方面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上层建筑领域不断进行政治大革命。实践证明，这样是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邓小平是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伟大旗手，其思想解放的最大成果就是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果断地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失误，反复强调社会主义

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经济的运行手段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重要思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第一次把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价值手段与价值目标的高度统一；立足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理论，正确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对世界发展的格局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确立了我們观察和处理国际、国内问题的新视角，最后把全党同志的思想统一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中。

在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上，党的三代领导人分别在不同的时期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毛泽东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在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路线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原则。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站在时代发展新的高度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提出了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核心的新的建党学说，全面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是解放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出现了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如何建设党、把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是新的历史条件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国际格局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意识形态“分化”的严峻挑战，如何化解加入 WTO 带来的风险，如何解决国内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我们党既面临着更多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这更加要求我们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被称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第三个历史宣言书，他向全党提出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历史任务和如何建设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学说新的里程碑。《讲话》紧密结合当前实践的发展，提出了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新课题；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分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样化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时代任务；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新概括，提出了“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新要求；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对党的高级纲领和低级纲领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新认识。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解放思想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形态，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二）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础

统一思想才能统一行动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这是我们党从一个小党、弱党成长为一个政党、强党，从一个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发展为一个领导建设的执政党八十多年奋斗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当然，统一思想有统一于正确的思想和统一于错误的思想之别，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我们党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中，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如果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必然带来实践的失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们对解放思想的认同感越来越强，与此同时，统一思想的难度也在相应地增大：一是从社会存在的客观性方面来说，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重化、社会阶层的多样化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化。二是从认识主体方面来考察，由于人们的教育程度、知识结构、历史背景和认识能力上的差异，决定了对于同一个事物认识上的差别性。江泽民先后提出对干部进行“三讲”教育，加强对“四个如何认识”问题的研究和“四信”教育，非常明显地表明了他对加强思想统一问题认识的高度关注。

我们党现在是一个拥有六千多万党员、带领十二亿多人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变幻不定的国际局势和日益复杂的国内改革，对加强党的思想统一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特别是在加入 WTO 以后，一方面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逐渐加大。因此，加强党的思想统一，对于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防腐拒变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想继续成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更好地代表人民执政，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理论加强和改进自身的建设，就必须根据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的新变化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要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社会主义要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就必须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人民带来

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人民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财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因此，我们今天说要统一思想，首先要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地学习“三个代表”，宣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其次，正确认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关系，科学理解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先进性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僵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坚持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但是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决定了我们党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前提下，必须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扩大为党的阶级基础，这样才能提高党的战斗力、影响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现状出发，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知识分子扩大为党的阶级基础。江泽民针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条件，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在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的党员作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的同时，进一步把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到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上。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有利于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更好地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是统一思想的前提和先导，统一思想是解放思想的目的是归宿，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的思想路线，它是马克思主

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解放思想纳入党的思想路线，科学地阐明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思路。

回顾一下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三个历史宣言书，我们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第一个历史宣言书是 1978 年邓小平《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它的主题是反对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对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科学地揭示了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根本原则：“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①后来，他更加明了地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性：“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②他认为 实践在发展 历史在前进 认为思想解放已经到头、甚至过头的想法是完全错误和有害的。第二个解放思想的历史宣言书是 1992 年的南方讲话 他在实事求是地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认识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关于这个问题 他早在 1979 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主张，但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7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64 页。